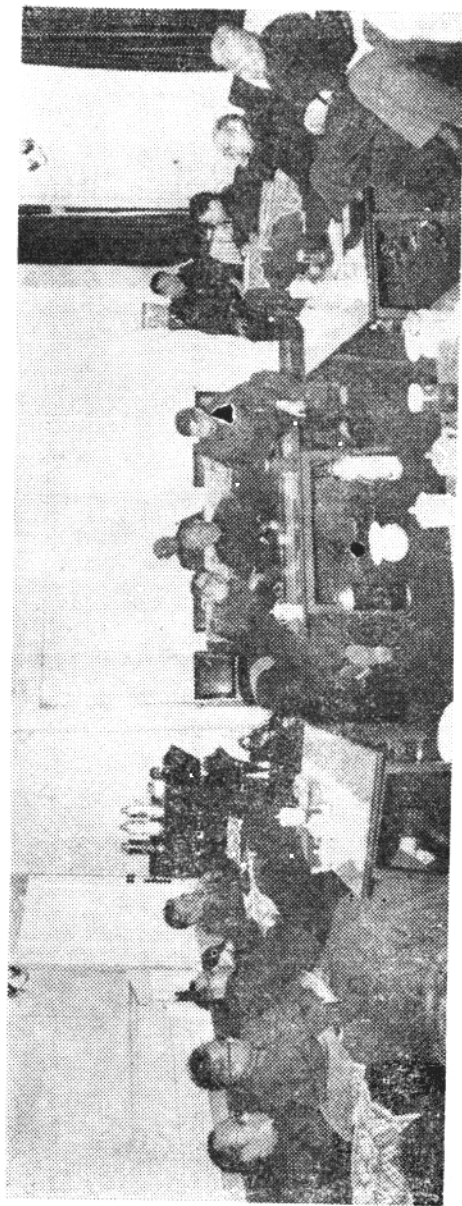


# 武漢新聞史料

第二輯

長江日報新聞研究室

一九八三年十一月



《大刚报》史讨论会于一九八三年五月上旬在汉口惠济饭店举行，曾经在《《大刚报》工作过的》二十余人参加了会议。来自北京、天津、南京、桂林和武汉的同志欢聚一堂，根据《大刚报史（未定稿）》和《解放后的大刚报（征求意见稿）》，开展了热烈的讨论，进行了分析和核实，提出了进一步修改的意见。

中共湖北省委顾问、解放后公私合营《大刚报》社长李尔重同志出席了会议，并作了热情而中肯的发言。

（李 云 摄）

## 访问中南长江日报负责同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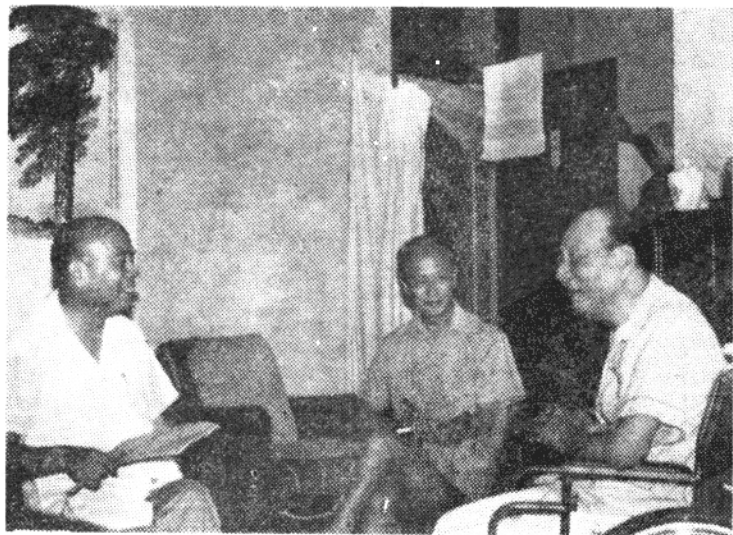
为了征集资料、编写中南长江日报的报史，今年夏秋之间，长江日报新闻史志编辑室的同志，在北京访问了原中南长江日报的负责人熊复、陈楚、张铁夫、顾文华、吉伟青、黎辛、王栋和谢冰岩同志。他们抽出宝贵的时间，回顾了筹建出版中南长江日报的经历，从不同角度介绍了中南长江日报的情况，提供了可贵的报史资料。顾文华同志下肢瘫痪，仍然热情地接待来访，介绍情况，并于当天下午亲笔写信和挥笔题词，对编写中南长江日报史提出恳切的希望。黎辛同志接谈后，还三次来信，对中南长江日报的编写提纲提出建议，答应尽快写出有关回忆文章。

下图：顾文华同志（右）坐在轮

删繁就简  
三秋樹領  
導標新之日  
花  
一九八三年七月二日  
顧文华

椅上介绍中南长江日报的情况。

（万林摄）



# 目 录

## 亲切关怀 严肃教导

### ——回忆五十年代武汉市委对报纸工作的领导

.....陆天虹 (1)

✓对如何评价《大刚报》的看法.....王淮冰 (17)

✓解放后的《大刚报》.....朱文尧执笔 (29)

### 正确开展报纸上的批评与自我批评

——中南《长江日报》史料札记.....朱帆 (41)

✓介绍中南《长江日报》，“社会服务”栏

.....本刊编辑室 (52)

✓关于《中南工人报》.....张金三 (55)

## 暮鼓晨钟

——介绍大革命时期武汉地区革命刊物《武汉妇女》、

《湖北妇女》.....章明 (61)

忆武汉记者随周恩来同志去宣化店.....徐实 (73)

我所知道的政论家詹大悲烈士.....傅光培 (79)

✓我们的地下报纸《新华电讯》.....孙昌前执笔 (83)

✓国民党华中喉舌——《武汉日报》.....方鸣 (88)

辛亥革命前后武汉报刊的回顾·····	杨 铎 (101)
武汉报刊史话·····	赵 钱 (110)
晚清武汉基督教报刊简介·····	陈 忠 (119)
✓ 读者·作者·编者·····	(122)
新闻研究资料·····	(124)
武汉地区期刊目录补遗·····	徐明庭 (125)
照片说明：①大刚报史讨论会·····	(封二)
②访问中南长江日报负责人·····	(封三)

·····

小启：本刊第一辑由本报新闻史志编辑室编辑，  
出刊日期为1983年6月，第二辑起由本报新闻研  
究室编辑。

·····

# 亲切关怀 严肃教导

## ——回忆五十年代武汉市委对报纸工作的领导

陆天虹

在本文中回忆的主要是从一九五〇年到一九五八年中共武汉市委是怎样领导自己的机关报的。由于时间隔得久，手头又无资料，八年中间曲折甚多，不可能回忆得准确、完整，只能就亲身经历，选择印象较深的几件事回忆出来，供大家参考。

一九四九年五月十六日武汉解放，当时武汉市委还没有自己的机关报。中南局机关报《长江日报》在武汉创刊后，兼顾武汉的宣传报道，副总编辑顾文华同志经常列席市委会议。一年后，由于中南全境解放，《长江日报》需要面向六省二市，对武汉的报道不可能兼顾。因此市委决定从改造民办《大刚报》着手，逐步创造条件，创办市委机关报。一九五〇年九月一日起《大刚报》实行公私合营，直接由市委领导；一九五二年一月一日《大刚报》停刊，市委机关报《新武汉报》创刊；一九五三年一月一日起中南局机关报停刊，决定《新武汉报》改名《长江日报》，兼负中南局重要文件、政策方针和言论的发布任务，并通知六省二市继续订阅《长江日报》。

一九五〇年九月，市委委派我以公方代表身份进入《大刚报》，历经变革，到一九五八年九月我调去市委工作，这八年中我都是报社的实际负责人。一九五〇年我还是新闻战线的一名新兵，不足以担当重任，只是武汉市委主要领导同志们的亲

切关怀，严肃教导，言传身教，几乎是耳提面命，才得以基本完成任务。老一辈革命领导人的思想理论修养、优良的传统作风和科学的工作方法，对新闻工作的深切关怀和培养教导，是报纸发展前进的关键。而我就是在接受市委领导的过程中，不断地充实和成长，离开了党的领导和培养，我是难以成为一名称职的党的新闻工作者的。

## 一、为报纸确定办报方针，指引方向

在五十年代先后担任过市委主要领导的有：李先念、王任重、张平化、吴德峰、宋侃夫、李尔重等同志。他们都直接关怀和指导报纸工作的方向和办报方针。尔重同志则是直接领导者，在报纸工作中，他花的精力最多，指导最具体，写作最勤。

解放初，《大刚报》仍然以全国性大报的面貌出现，政治性新闻多，工商界市场新闻多，社会新闻多，副刊多，而且多属动态性的，不能适应党指导工作，宣传马列主义和党的方针政策的需要，读者停留在少数知识分子、工商界的狭小范围内，不能适应广大干部和工人群众的需要。

市委领导在讨论报纸工作时，市委书记张平化同志着重指出：城市报纸应该以生产为中心，要认真贯彻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精神，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要把一切工作围绕恢复和发展生产来进行宣传，读者对象要以工农群众及其干部为主，兼顾知识分子、小资产阶级的需要。为此一定要放下大报架子，面向地方，面向群众。市委副书记谢邦治同志提出报纸是对开大报，架子太大，不便深入群众，不如改为四开小报，广告也太多，要减少。市长吴德峰同志则主张，大城市的报纸还是以对

开一大张为好，广告可以减少一点，但工商文娱广告还是要的，一来城市人民有这个习惯，二来也可增加报纸的收入。宣传部长李尔重同志要求报纸一定要为工人服务，为生产服务，开展工农通讯员运动，并且要组织大批干部当报纸的通讯员，市委发通知动员大家为报纸写稿，政府各部门要为报纸发文件、材料，通知记者参加会议，提供情况。这样，报纸的方针就明确了，为整个报纸的改造提出了方向。事实证明，这样的改造受到广大干部和工人群众的欢迎，发行量迅速增加。

一九五二年《新武汉报》创刊，张平化同志亲自撰写了发刊词，指出：报纸应坚持党性、地方性，群众性，坚持党性原则是主要的，但如不同时坚持地方性和群众性，党性也无从体现，因此应该是党性、地方性和群众性的统一。这篇发刊词立论精辟，文字简炼，逻辑性强，发表后引起了宣传界、新闻界广大同志的重视，中南局宣传部的同志也认为是关于党报性质的一篇难得的好文章，其他报纸也有参考价值。

一九五二年，由于“纪凯夫事件”的错案发生，市委改组，李先念同志来市委任书记兼市长。先念同志主持市委常委会后的第二天，他的秘书打电话给我，要我下午去先念同志的办公室。我按时到达他的办公室，见尔重同志也在座，我是第一次受先念同志个别接见，感到很拘束。但是先念同志非常亲切、随便，他说，我来武汉需要同各方面的同志见见面，谈谈话，了解各方面的情况，今天是同宣传部长、报社总编辑随便谈谈。谈话中，先念同志主要是了解市里的各方面情况，询问各方面对市委领导的看法。先念同志确实平易近人，态度随和，谈话中还插进一些风趣幽默的语言，我的紧张心情顿时消失。在我面前的几乎不是我在传闻中听到的叱咤风云的统帅，而是循循善诱的革命长者。最后我请示先念同志对报纸工作有什么指



示？先念同志说，报纸我是每天要看的，报纸要准确反映市委的领导意图，你列席市委常委会就要很好领会市委的指导思想。每次会我都要讲话，大会要做报告，我讲话是不打稿子的，你们认为需要可以发表，但是一定要很好整理，仔细推敲，必要时也可以送给我看。这次会见，使我感受很深，一张党报决不能辜负领导的期望。因此在以后，我每次参加市委会议或听先念同志报告时，总是详细记录，在消息中发表有关他的讲话时总是认真推敲，仔细核对，以免失去原意。

但是，我的水平毕竟有限，知识面也很窄，在领导报纸工作中还是出现了问题。问题主要出现在文艺宣传上。一九五三年，先念同志刚去中南局任副书记，但仍关怀着长江日报的工作。他发现长江日报的文艺副刊“文化广场”的情调不对头，他指示市委书记王任重同志召开常委会专门讨论一下长江日报的工作。事先平化同志在他家里接见了我们，要我们准备汇报工作。常委会是在王任重同志的办公室里开的，到会的有市委副书记张平化、宋侃夫、李尔重、宣传部长曾惇等同志。我同郭治澄、曾卓同志参加了会。首先由我汇报了报纸各方面的工作，当汇报到副刊“文化广场”时，我说这个副刊读者还欢迎。这时，平化同志严肃地说，到底是哪些读者欢迎？接着任重同志传达了先念同志的指示，说先念同志批评了《长江日报》的“文化广场”，象荒野里的一棵草，情调不健康，迎合了小资产阶级的趣味。现在第一个五年计划已经开始，武汉开始了大规模的工业建设，都是属于一五六项的重点建设工程，从报纸上反映不充分。任重同志还拿出《人民日报》的合订本，指示《长江日报》应该学习《人民日报》改进宣传报道，要突出第一个五年计划大规模经济建设的宣传，派记者到工地去。平化、尔重同志都指示，文艺宣传一定要坚持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

讲话的方针，文艺要为工农兵服务，面向工农兵，克服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情调。

这次批评，对我是很大的震动，因为从我办报以来，经常受到市委领导的关怀和鼓励，认为短短几年，报纸的改造和发展很有成绩，有自满情绪，加上自己对党的文艺方针学习、理解不够，指导思想上和广大工农兵的要求，和生气勃勃的大规模建设的实际生活还有一定差距，这就必然造成宣传上的偏差。但仔细领会先念同志和市委领导的批评，又觉得批评击中了要害，教育很深，应该以此为契机，使报纸宣传紧紧跟上社会主义建设的脉搏，来一个转变。为了贯彻市委的指示，在编委会进行了传达讨论，并且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派出大批记者长住重点建设工地，在版面上突出了工业建设和城市工作为工业建设服务的方针，半年以后，报纸有了显著变化。大规模经济建设的报道占了主要版面，一批记者长期深入在各大建设工程的工地，写回了不少质量较好的消息和通讯，从报纸上看到了社会主义建设的脉搏的跳动。市委感到满意，又一次召开会议，听取我们的汇报，对报纸的改进充分肯定，并提出了进一步的要求，要更深入更提高，要研究如何改进经济宣传，克服技术性，提高思想性，以鼓舞广大群众在建设中学会建设。

## 二、要求报纸宣传和党的领导意图完全合拍

市委领导经常告诉我们，报纸要作好党的喉舌，指导工作的得力助手，就要努力学习党的方针政策，并且要和市委的领导意图完全合拍。在组织上的措施就是吸收总编辑列席市委常委会，这从我办报起，张平化同志就定下了这个制度，一直坚持。平化同志、侃夫同志、尔重同志经常说，你们不要只是来

听会，还要反映情况，发表意见。

这样做的好处很多，首先是总编辑能及时了解和领会中央和市委的决定和指导思想，及时向编辑部传达，迅速变成报纸的宣传思想和报道方针。其次，便于总编辑了解市委领导，特别是第一书记所思考的问题和各条战线上全面情况，当市委领导的集体决定作出时，总编辑的宣传思想也随之成熟，能较深刻、准确地体现党的方针政策，这就能保证党报的宣传和党的意图完全合拍。再次，总编辑每周参与了党委的集体活动，领导同志的言传身教，使总编辑在党的领导集体的熏陶下，在政治思想上尽快得到提高。当然，我们自己也要努力发挥主观能动性，努力学习马列主义理论，调查研究，才能深刻领会中央和市委的意图，并且善于运用新闻的各种手段来正确地宣传党的方针政策。

我印象最深，至今不忘的是市委领导同志亲自动手撰写社论和重要文章，大大加强了评论的思想性和指导性。同时也起了示范作用，推动报社领导努力研究和提高评论和指导性文章的质量。李先念同志、吴德峰同志和王任重同志的重要讲话，我们整理好以后送去审阅时，他们总是迅速修改后送回发表，并且在原稿上批注：“修改之处请报社同志酌处”，这种谦虚的作风很是感人。王任重同志十分重视帮助报社领导提高文章的质量，他曾亲自主持召集报社领导干部座谈如何提高评论和文章的质量，把读书、工作和写作三者很好地结合起来。他自己也喜欢写写杂文和新诗送报社发表。一九五四年，武汉一百天防汛斗争取得胜利，人民日报约请任重同志写一篇总结性专文，任重同志写好后特地送到报社要我们帮他看看，提提修改意见。

张平化同志写的文章数量少，但是质量高，思想性、逻辑

性都很强，文章结构严谨，用词遣句准确，文风朴实，每个标点符号都一丝不苟。文章见报后如发现了一个标点的错误，他也会打电话给我，要求更正。在市委开会时见了面，他常提醒我：“你们报纸上又出现了差错，语法标点有毛病，有的是校对错误。你们要有严肃认真的作风。”这种批评虽使我脸红，但感到亲切，我们曾为此在报社开展过为消灭差错而斗争的运动，并拟定了编、排、校、审、印等十个环节的责任制，收到了效果。

撰写社论或修改报社送审的社论最多的是李尔重同志。五十年代的《新武汉报》到《长江日报》是在尔重同志的直接指导下成长起来的。我已记不清他为报社写了多少篇社论，反正每逢党中央有重要指示，市委有重要决定，他就主动把社论写好送来。每逢重大政治事件，重要节日，我们自己没有把握时，只要给他打个电话，请他写篇社论，他没有不应允的，而且往往上午约稿，晚上十点后去取稿，稿子已写好了。有时时间紧急，下午约稿，晚上到十二点去取稿，稿子也已写好。尔重同志撰写社论，思路敏捷，抓住要害，理论性强，说理透彻，有文彩，为报纸生色不少。当然有时时间仓促，也有推敲不够，或文字不够严谨，显得松散的。因此他常对我说，对他写的社论如有不妥可以修改，我们也常常修改，重要修改向他打个电话，他没有不同意的。

重要的是尔重同志为我们审阅社论，修改社论。对一些重大政策问题，我写的社论有时因理解不透而表达不充分，对实际情况了解不准确而论述不到要害。每逢这样的稿子，尔重同志总是亲自修改，往往是大段大段的重写，有一次只保留了题目和引言，主要段落全部改写了。第二天见面，他说因为当晚要发表来不及面谈了，你们对党的政策和实际情况还要深入领

会研究。对于尔重同志的修改我总感到非常信服，并且乐意请他修改。这是磨炼和提高自己的好机会。他确实是带领我学会办好党报、写好社论的好老师。

在市委书记带动下，市委各部部长也很重视如何帮助报纸做好自己分管范围内的宣传报道，并且动手写社论。如宣传部长曾惇同志、工业部长韩克华同志等都常常找我研究写有关思想问题和工业问题的社论，他们自己也动手写社论。

黎智同志任宣传部长期间管报纸工作，又是另一种作风。他发现我们每逢大事总是找书记写社论，他不以为然，说你们不要有依赖思想，也不要写社论神秘化，要靠自己写，并且编委和各部主任都应该写，写一遍不行写两遍，改好为止。这对推动编辑部中层领导干部动手写社论起了很好的作用。这样，慢慢就提高了，熟练了。在一九五六年社会主义改造胜利进行时，北京实现了全行业的改造，黎智同志当晚看了新华社电讯，立即抓住时机，自己动手，写了一篇五百字的社论：《向北京看齐》，第二天见报后，武汉三镇传诵一时，有的抄下来贴在大门口，工商界立即行动，举起“向北京看齐”的标语，掀起了全行业改造的热潮。市委领导同志们在开会时交口称赞，这样的社论好，号召性强，这就是舆论的指导力量。

报社领导必须和党委溶合一体，党委和报纸才能做到头脑和臂膀一样的配合默契，指挥自如。一九五四年，长江流域遭受百年一遇的特大洪水的侵袭，武汉被洪水包围，一百万人上阵战斗一百天，终于取得胜利。在这一百天的日日夜夜里，报社领导真正做到了和市委溶合一体，起到了宣传、动员、组织、指挥的作用。六月下旬，中南局指示市委发布防汛动员令，我接通知到了王任重同志的办公室，中南局刘建勋秘书长和市委书记正在研究动员令和有关防汛的部署。我对动员令在文字上提

了一点修改意见，通过后带回报社发表。自此一百天内，报社领导分为两线，我在编辑部掌握全面，郭治澄同志每晚参加防汛总指挥部的会议，密切注意雨情、水情、堤防、上下防汛斗争的形势，和指挥部所作的分析、采取的措施等，当晚写成社论，第二天见报。大批记者分驻各分指挥部深入采访，有时用电话发回稿件。百万大军分布在三镇两百公里的长堤上，报纸每天及时送到工地，每天的社论和有关报道成为鼓舞斗志，指导行动的武器。

### 三、联系实际，联系群众，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是党报的传统

市委领导经常用党的联系实际、联系群众、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党的三大优良作风，教育我们，要求我们具体体现在报纸工作中。而领导同志本身也是这样向我们示范的。

张平化同志有一个很好的领导方法，即凡是找他找基层领导汇报工作时一定通知我去参加，他下基层调查研究时只要有空也总是要我同去，这样的次数是不少的。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在一九五二年夏天，解放后第一座新建国营工厂——武汉国棉一厂建成投产了，坐落在汉阳龟山之麓原汉阳钢铁厂的旧址上，平化同志通知我和他一起去参观。当时大桥尚未建成，车到集稼咀码头坐渡船过汉水来到国棉一厂，在厂长陪同下一个个车间一道道工序参观，并请工程师讲解生产工序、产品的质量要求等。然后又到宿舍、食堂仔细参观，同工人谈话。全新的工厂，全新的设备，新中国招收的第一批新工人，全是中学生，工厂又象个学校，到处生气勃勃，喜气洋洋。车间骨干是

从老纱厂调来的老工人，他们感慨地对平化同志说，新社会真是好啊，这批新工人的宿舍简直象新房一样，我们当童工时过的是牛马生活，真是不能比了。平化同志对我们说，国家就要开始进行大规模的工业建设了，大家都要多学点工业知识，多了解工人群众，才能胜任领导。平化同志想得很远，我领会了他带我一同参观的意思。在国棉一厂吃了午饭，下午再去参观一个老工厂——汉阳油脂厂，隔着月湖。当年的月湖面积很大，满湖荷花，阵阵清香，我们坐了一条小划船在荷叶缝中前进，一路上说说笑笑，采摘几片荷叶遮住太阳，我忘了是随同市委书记参观工厂。这样的领导作风，今天回味起来，觉得留恋难忘。油脂厂是个老厂，陈旧的厂房，陈旧的设备，笨重的劳动，老工人们流汗、在一丝不苟地操作，在这里平化同志表情严肃，和老工人们亲切交谈。平化同志感慨地说，实现工业化不容易啊，除了建新厂还要改造老厂，用机械化来代替笨重的劳动。象这样的随行参观，真是受益匪浅，大大丰富和提高了我对工业的报道思想。

尔重同志是直接领导报纸工作的，经常找我们听取汇报，指导报道思想。但他不是坐在办公室里领导，而是跑到报社来，有时把编委们带到中山公园去，坐在茶室里，掏出自己的稿费泡壶茶，请大家吃冰淇淋，无拘无束地交谈，在漫谈中，交流宣传思想，形成社论的主题，确定社论的计划。他这个宣传部长和别的宣传部长不同，他经常在各个工厂调查，钻研工业生产，同我们谈话时谈起工业生产和老工人的生产生活情况时，简直如数家珍。他对我们有时汇报宣传工作比较空洞抽象就不满意。他经常说，宣传不能停留在抽象的概念上，要熟悉工业生产，要熟悉工人，宣传才能有的放矢。正是在市委领导的言传身教的指导下，五十年代的长江日报在工业经济宣传上

积累了一些经验，并且具有自己的特色。王任重、张平化同志一九五五年后都调任湖北省委书记，但仍然亲自指导《长江日报》的工作，要求和《湖北日报》有明确的分工，要在工业经济和科学文教的宣传上保持特色，发挥特长，以影响其他中小城市。因为武汉是中南的大城市，而报纸是不受行政区域限制的，哪个地方都可订阅，长江流域都可订阅。

党中央关于在党报上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是有专门指示的，这也是党报的优良传统，是党的优良传统。但是我们在开展批评上领会不深，胆子不大，特别是涉及领导干部时，顾虑很多。一九五三年为了打开这个局面，中南局曾指示武汉市委领导亲自抓一下，尔重同志就坐到编辑部来，把读者来信一封封地翻阅，询问记者所了解的情况。当时党对干部中滋长的官僚主义、铺张浪费、贪污腐化的风气，那怕是萌芽状态的、轻微的，也是不容许的，要求报纸抓住这三方面的典型大张旗鼓地公开批评。在尔重同志指导下，从读者来信反映的情况中选择一批典型，经过调查，在一版头条连读公开批评，被点名的有大厂的党委书记，区级局级干部和个别副市长。这对社会的震动很大，这样的批评对干部的教育作用、对保持党风的纯洁性，对改造社会风气，起了不可估量的积极作用，同时也教育挽救了被批评的干部。这样，在报纸上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就成为一种正常的政治生活，被批评者只要检查改正就可以了，不符合实际的加以说明就可以了，不存在揪辫子、打棍子、戴帽子的歪风，更不存在被批评者从此抬不起头来的问题，真正做到了有则改之，无则加勉。五十年代在报纸上公开地、正确地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对于建设好党风和好的社会风气起了积极的作用。

一九五三年，报纸在一版头条批评了某区公安分局局长罗



瑞的错误，恰好这时毛主席在武汉，看到了长江日报上的批评报道，高兴地对随同的罗瑞卿同志说，长江日报不错啊，很有战斗力啊，你可要当心啊，这个罗瑞只比你少一个字啊。当时担任警卫任务的市公安局局长谢滋群同志特别向我们转告了毛主席的赞扬，对我们是很大的鼓舞。

当然，开展批评并不总是顺利的，有时批评的方向难免不够准确，有时也有失实或过火之处。这时必然会引起一些同志的批评。当报社遇到这类情况时，党委都及时召开会议，实事求是地加以处理，市委领导首先在指导思想承担责任，不是一味责备报纸，而是既保护报纸开展批评的积极性，又恰当地加以引导，使之纳入健全发展的轨道。一九五四年，在建设华中工学院的施工中发生严重浪费现象，报纸的批评稿中同时提到了建设规模问题，引起了同中南行政委员会教育部的分歧。中南局宣传部为此召开会议，赵毅敏部长、陈楚副部长，中南文委潘梓年副主任等参加会议，进行了分析，认为华中工学院高等教育区的建设是国家重点项目，规模大是必要的，但施工中的浪费和忽视质量问题应该批评，施工单位应该改正。对我们如何正确地开展批评，进行了具体帮助，指出既要大胆批评，又要严肃认真，力求准确。

对于开展批评所引起的反响，市委领导同志特别注意批评的效果，要有利于整顿党风，改正错误，教育一般，不是为批评而批评，也不是批评越多越尖锐越好。主要是选择有普遍教育意义的典型，至于一般批评性的来信应该转给被批评者所在单位的领导去解决。同时，张平化同志经常指示，表扬与批评不能偏废，而应以表扬为主，对于工作中、社会上出现的大量先进的、积极的、特别是为了国家和公共利益，作出自我牺牲的共产主义思想因素，那怕是微小的事迹，也要表扬，这才是社会